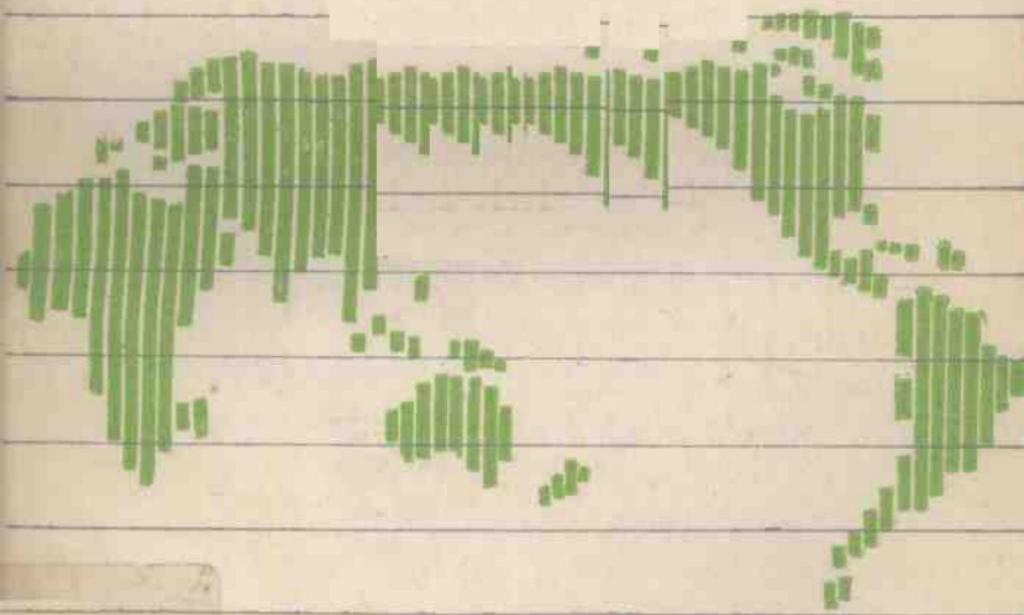


外国新闻选评

WAI GUO XIN WEN XUAN PING



宁夏大学图书馆编

代 序

学习·借鉴·创新

——漫谈外国新闻写作技巧

王 峰

为了使我们的新闻写得生动活泼，为群众所喜闻乐见，除了发扬我们报纸的优良传统、丰富报道内容以外，在写作技巧上，从外国新新闻中取得借鉴，是很有必要的。

“新闻不是有阶级性吗？怎么可以让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去向资产阶级记者学习呢？”这是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写什么样的新闻，为谁服务，确实是有阶级性的；但是新闻的写作技巧，却是没有阶级性的。我们不能以新闻的阶级性为借口，拒绝吸取外国新闻的某些长处。新闻事业本来发源于外国，自一八三五年世界上第一个通讯社——哈瓦斯通讯社在法国巴黎创办以来，西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很快，确实积累了一些经验。象电影《望乡》中描写的记者三谷圭子，为了弄清日本“南洋姐”的情况，亲临实地考察，住到当事人家里访问，那种深入的采访作风和严肃的写作态度，不是很可以给人一些启发吗？

事实证明，外国新闻的某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也应该来一个大胆“引进”，解放思想，博采众长，努力创新。

那么，外国新闻里有些什么主要的东西可供借鉴呢？下面谈一点个人的意见，以期引起大家的兴趣。

坚决禁绝与事实无关的空话、废话。把实质性内容突出出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美联社播发了美国先驱者一号航天器进入绕金星轨道的新闻，第一段是这样的：

“先驱者一号今天进入绕金星轨道。这项计划是为了使科学家们对距离最近的行星作历来最真切的观察。”

寥寥两句，把一件重要的科学考察事实以及要达到的目标交代得清清楚楚。由此想到我们的核弹爆炸新闻，每一次都是“在××关怀下”，在××指示下”，“是××运动的胜利”等等堆砌起来的政治术语，而实质性内容如：这一次比上一次有什么发展、进步等等，却没有交代。

写法多种多样，不拘一格。我们的新闻，消息、通讯、述评的写法，一般总是严格区别，不能混淆。外国新闻就分得不那么清楚。只要需要，人家愿意看，随你怎么写都行，不怕“不伦不类”。以会议消息为例，我们时常总是一个套子，千篇一律，以致会议消息成了报面上“不受欢迎”的新闻之一。而外国的会议新闻，却常常是千变万化、不拘一格的。对会议的实质性内容的议论，也常常是一针见血，很有分析和见地。这里举一个合众国际社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关于一次有关硅的国际座谈会的消息，头两段是这样的：

“在自然界没有人看见过一块纯硅，但这种元素却占地球地壳的大部分，科学家们发现，如果没有硅，生命大概不

能维持下去。

世界的许多硅专家昨天聚集在里士海的约翰·马歇尔饭店，就他们喜爱的这个题目举行四天的座谈会。”

这条新闻，一开始就把硅的特点以及科学家研究硅的重要性作了说明。这就把这次会议在科学上的价值和意义显示了出来。时间、地点也交待得简洁而清晰，同时还增强了这条新闻的知知性。

善于运用背景材料。外国新闻报道对背景材料是运用得较好的，常常是谈今涉古，巧摘妙引，恰到好处，以上面的国际硅座谈会的消息为例，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原始的单细胞海生动物，如海绵和硅藻，使硅沉积于整个海底，形成庞大的硅石层，在玉米和大麦茎秆中发现的硅成份表明，硅在有价值的作物的成长中有着重要作用。

硅也有其害的一面，因为它是引起矽肺的因素。”

这些话，与会议本身并无直接关联，作者考虑到硅虽然是科学家们所熟悉的，但是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却是生疏的。这样的背景材料，就非写不可。作者把硅这种相当复杂的元素的历史及其对人类的利弊，作了通俗易懂的介绍，从而烘托了这条会议报道的主题。我们有些新闻，不大爱用背景材料，即使写一些，也往往“高深”之至，离不开众多的科学术语、化学符号、物理公式，使大多数读者为之茫然。这往往是由于我们记者的知识面太窄太浅造成的。试想，光靠一知半解，照抄一些技术说明，怎么可能运用得好背景材料呢？

富于浓厚的趣味性。外国不少新闻，写得很有意思，尤其是技术新闻，往往有独到之处。例如去年《参考消息》上

刊登的外国报刊上介绍蚯蚓、田鼠的文章，就是很好的科技新闻的例子。这些文章，用生动的笔触而不用一连串的数字，用典型的事例而不用许多“条条”，来描绘蚯蚓等的习性、生活史、作用，描绘人类研究利用它们的进展情况，从大规模的工业使用，直到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无所不谈，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人。有的甚至象一篇优美的科技散文，让人一口气读完，並且久久地加以回味。

标新立异作标题。外国的新闻标题，大都追求新鲜、醒目，体现新闻的主题；风格也比较多。比如邓副总理访美期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自莫斯科发了一则报道，题为《中国有人，美国有机器，俄国有的是担心害怕》，单单看过这个标题，对记者报道的苏联对邓副总理访美的态度，也就略知一二了。

除了用一般陈述句作标题以外，经常使用各种标点符号，特别是冒号，是外国新闻标题的重要特点。请看几个标题：《罗马尼亚不怕激怒苏：华约分裂扩大》，《激光：技术奇葩》，《铝——神通广大的金属》，由于使用了标点符号，让人一目了然。还有不少外国新闻，虽然比较长，但常常在每一部分前都把主要意思用一句话标出来，象个小标题，却只在文中不另起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有些同志觉得标题上使用标点以及文中这种“画龙点睛”的方法不适合我国群众的阅读习惯，这不免有些过虑了。我们不妨尝试一下，看看群众究竟爱看不爱看。前些天，关于发扬民主的报道，内容是很好的，但标题却老是“发扬民主”、“坚持发扬民主”、“只有发扬民主才能如何如何”，过来过去就这么几句话，沉闷而平淡，写不出新意，群众不是已

经对此提出了批评吗？可见，从外国新闻中得到一些启示，切实改进一下新闻标题，使之生动活泼一些，开放一些，群众恐怕还是欢迎的吧！

以上意见，都很肤浅，而且难免有不当之处，目的在于引起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如果能开展一点讨论，我们的报纸就能办得更好一些。当然，改进新闻写作，最重要的还是在深入实际搞好采访上，但那就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4) 希雷克·魏因堡——《新闻学》(1973年)：希雷克·魏因堡是美国著名的新闻学者，他于1973年出版的《新闻学》一书，对新闻学做了全面的阐述。该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新闻学概论”，主要探讨新闻学的性质、新闻学与新闻传播、新闻学与新闻工作、新闻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第二部分“新闻传播学”，主要探讨新闻传播学的性质、新闻传播学与新闻传播、新闻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第三部分“新闻传播学研究”，主要探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途径等。该书对新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 录

改革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好处……秦家聪	(1)
把他们稳在中国的农村	
——访四川的一个大队……罗伯特·克雷布	(4)
私人裁缝生意兴隆……迈克尔·兰克	(8)
警察帮助多年失散亲属团聚……迈克尔·兰克	(11)
幼儿园一瞥……维多利亚·格雷厄姆	(15)
看拍摄电影《庐山恋》……查尔斯·纳尔西娅	(19)
北京的夜市……龙布乐	(22)
钱粮胡同……维多利亚·格雷厄姆	(26)
北京的美容院——四联理发馆……罗伯特·克雷布	(29)
清朝贵族：我过上了真正幸福的生活	
……维多利亚·格拉汉姆	(31)
鼓楼街唯一剩下的几个太监……维多利亚·格雷厄姆	(38)
欣欣向荣的中国地下城……雷蒙德·威尔金森	(43)
上海——特异的城市……伊丽莎白·张	(46)
皇帝的地下大军……麦克斯韦·何恩	(50)
北京烤鸭——顶儿尖儿的烹饪艺术……安·斯科特	(54)
人类的好友伴——烹烤咸宜……艾琳·莫斯比	(58)
中国的秋天……约翰·罗德里克	(61)
中国的道庙恢复了平静与美丽……冈孝	(65)

被宠坏了的一代	维多利亚·格雷厄姆(68)
溺婴	里查德·帕斯科(72)
中国劳教农场的一瞥	格雷厄姆(76)
中国的劳教营和劳教犯人	伊丽莎白·张(79)
中国展销会在美国	洛伊俄·哥·卡特(86)
中国举行美国电影周	菲尔·布朗(89)
美国乐队指挥给中国带来新音乐	菲尔·布朗(92)
“爱伦”台风肆意逞威	马修斯·龙(96)
战胜癌症记述	(101)
请设想你是一个黑人	雪莉·斯科特(105)
罗宾斯坦的“爱情”	(109)
波尔布特军队在柬泰边境丛林中出现	芒空·塔伦翁(111)
救救威斯康星的河流吧!	理查德C·基尼茨(114)
奥希威辛没有新闻可写	罗森塔尔(119)
龙卷风扑过来了!	约翰·保尔逊(123)
家园被毁，不忍卒睹	尤恩·兹杰拉尔(125)
虎	(128)
“绝种的”大羚羊在原野里繁殖生仔	(132)
历史就在我们眼前爆炸了!	梅里曼·史密斯(134)
他们是制造痛苦的贩子	威廉·琼斯(141)
纽约街头的流浪者	米歇尔·艾比奇(146)
经济衰退冲击下的美国家庭	纳尼尔·谢泼德(147)
“说不定到不了今天晚上我便一命归西了!”	(150)
甘地遇刺：“父亲死了	詹姆斯·迈克尔斯(154)

里根入主白宫记	乔·其·丁·丘奇	(158)
旧金山毁灭了	杰克·伦敦	(167)
巴伦支海底捞金记	金·罗戈尔	(175)
来自百老汇和主街的小伙子们	恩尼·派尔	(180)
艰苦的步兵	恩尼·派尔	(185)
随轰炸日本的机群采访	威廉·劳伦斯	(190)
纳粹战犯朱里叶斯·斯特雷切	史密斯	(197)
一句话新闻(十六条)		(208)

改革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好处

《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 秦家聰

熊保海是个幸福的人，他是北京南郊黄土岗人民公社副主任，今年四十八岁，一辈子在这里生活。他说，“形势从来没有象这样好过，农民满意、产量高。”

熊保海自豪地请来访者参观土暖房里种的黄瓜、西红柿和其它农产品，虽然外面的地面上复盖着皑皑白雪。该公社还种植鲜花给北京市的居民，从中获得了一笔很大收入。

熊保海说，“这个地区种植鲜花已有七百年历史了。但是，在文化革命中，我们却为此受到了批判，有人指责我们在为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服务。因此，我们只好不种了。”

可是，现在确实实现了五十年代的自由化口号，百花再次吐艳争芳。北京实行的经济改革，主要是权力下放，已经给农民带来了新的刺激，而且效果十分明显。

养老金计划

熊保海说，在两年内，每人一年的平均收入已从一百二十美元增加到二百零四美元（按目前的兑换率从人民币折算成美元）。他的公社富起来了，全社十三个生产大队已经开始实行养老金计划。这种发展趋势可能有利于实现政府限

制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目标，因为农民年老以后历来只能依靠儿女照顾他们。

北京最富的公社要算四季青人民公社了，每人一年平均收入为三百三十七美元。有些村子每人年平均收入高达五百六十二美元。

上星期四（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上也刊登一条报道农民大大增加收入的消息。位于北京东南方向的山东省大曲大队几名社员在写给该报的一封信中说，他们生产队每人平均收入从1979年的仅仅二十二美元猛增到1981年的二百八十一美元。

大曲村大队的农民确实很富裕，去年有三十四名社员来北京观光，还在一家北京著名的烤鸭店吃了烤鸭。

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农村形势的变化是中国进行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之一。但是，官方承认，今后还有更多的事情做。

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最近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一篇少见的坦率的文章中透露，广大农村有一些农民的收入仍低于官方规定的最低生活水平。

杜润生说：“按照现在的物价计算，一个农民为了维持生活，一年至少要有一百二十元（六十七美元）的收入。”他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均收入高于这个数字，还有三分之一刚够这个水平。

杜润生说，“其余三分之每人一年的平均收入不到六十元（三十四美元），不够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他说，“这些农民只好靠副业收入，依赖政府救济，或者省吃俭用

才能对付过去。”

杜润生还说，自留地的产量往往高于集体耕地的产量。他说，“在广东省一些地方，自留地一年可以收六次，比集体土地的收获多好几倍。”

杜润生承认，集体化后产量不一定会提高，因为农民在耕种集体土地时常常认为不是为他们自己干活。

杜润生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立这样一种管理形式，

“在坚持集体经济的前提下，让劳动者自己掌管生产资料和劳动果实。”

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现在已经在这样做了，允许农民完成生产定额后，超产归自己。杜润生说，在实行这种措施的地区，产量上升了百分之三十。

简评：

稿件一开头就显示具体成果，然后再叙及产生如此经济成果的原因、农业政策中强调的某些原则、全国的情况等等。这种写法比一开始写上空洞的几句话，然后解释什么叫农业生产责任制，再罗列几个事例好得多。因为读者不必先在脑中把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些原则折腾一阵子，再了解这项新政策对中国农村是否合适。由鲜明的具体的事例到全面情况的交代，由生活再谈到生产，从具体感受谈起再介绍综合的具体分析的情况，往往是西方记者引起读者兴趣，把事物解释得清楚易懂，进而影响读者的手法。

我们写报道时，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把典型事例不分轻重地罗列起来。这篇稿子叙及的几个事例，交代时却有详有略。黄土岗人民公社的例子既说明责任制的效果，又说明农民对这项政策的评价。其它事例，择其要点来交代。读

者读后，感到中国农民生活确实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並不是限于极个别地区的偶然变化，而是具有方向性的。但是记者又引用了杜润生同志文章的内容。特别是他分析目前中国农民收入的三种情况，既给人以扼要的全貌，又使人们不会产生前述事例在中国已很普遍的错觉。读者会明白，中国农村发展前景光明，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当然，限于记者的立场，引用杜润生同志的文章时，有些断章取义之处。这是在阅读这篇报道时，应该注意的。

把他们稳在中国的农村

——访四川的一个生产大队

罗伯特·克雷布

（合众国际社重庆八月四日电） 拥有一千一百五十七户人家的锦岗（译音）生产大队去年添了六十个婴儿。这个大队位于长江边上的山岭上，其农田里到处都立着大大小小的山石。

这些孩子中，多数将永远也不会为了追求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或过城市生活而劳心伤神，他们的岁月将就在他们出生的农村中渡过——种植粮食、蔬菜或者养猪放牛。

四个副大队长之一的二十九岁的陈敏序（译音）说：“在我们这些孩子中，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够考上大学，几乎没有人会迁进城里去，大多数人仍会留在生产队

里。”

锦岗生产大队共有四千六百六十七口人，有二千九百二十二亩石山地，位于中国内陆四川省境内，靠近重庆。

他们解释说，雄心勃勃的中国现代化计划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人口太多了，城里没有这么多工作和机会容纳这些有聪明才智和抱负的农村青年。北京和上海已经充满了二十来岁的失业青年。

在十亿中国人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仍然生活在农村，政府竭力希望把他们稳在那里——心甘情愿地长期留在农村里。

陈太太解释说：“我们这个队就是所谓的山区生产队，我们有的是石头，但没有多少耕地。”

自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锦岗生产队的勤劳的农民，为了能多种些粮食，同布满田里的石头奋战了三十年。

白天，雷鸣般的炸药爆炸声不时地从四周田间传来，一座座耸立在田间的巨石被炸成了碎片。

石块都变成了有用之材。锦岗人民用它们砌房屋，在山边建梯田，以便多种庄稼，余下的石块被砸成碎石料卖给国家筑路。

锦岗大队也实现了一部分机械化，它有五辆卡车和一些手扶拖拉机，还有几台收割机。这些机械都不是为了代替人力，只是为了减轻一些劳动强度。

去年出生的六十个婴儿中，大部分是由接生员在家里接生的，只有那些难产的孕妇才被送到重庆附近的医院去。

同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锦岗生产大队也不希望生养更多的孩子。据陈太太说，政府提出的节制生育的计划大体上

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

“在过去，大多数人家有三个到四个孩子，现在一般只生两个。政府希望我们一家只生一个孩子，有些人同意，但多数人仍然想要两个孩子。”

锦岗生产大队为孩子们提供十年教育，但大部分教育是在那些白色砖墙的小学校里完成的。这些学校很少使用电灯照明，而是在屋顶上开天窗，蒙上一层透明的塑料薄膜，用以透光。

像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重庆地区电力奇缺。记者在锦岗大队转了两个小时，只看到一个电力装置——一台电动机在带动石碾转动。家家都接上了电线，但即使在晚上也很少亮电灯。

锦岗大队所属的公社是由五个生产大队组成的，一共有两万多人口。据陈太太说，这个公社还没有洗衣机和电冰箱。

这个地区已能看到电视了。集体所有的电视机有十台，还有两家存够了一笔钱，各自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

多数孩子从学校出来后就直接参加了农业劳动。只有少数孩子可能被派到城里去培训几个月后当小学教师或“赤脚医生”，即为农村服务的卫生员。另外少数几个孩子将被培训当技工。

全公社根本没有正规的医生。锦岗大队的四千六百六十七个社员是由五个卫生员给治病的。他们在在一个小小的医疗站一周工作七天，给大家拿中西药。和学校一样，医疗站也是靠屋顶上的天窗照明的。

男孩子到二十五岁结婚，女孩子可以早一两年结婚。据

陈太太说，多数青年不是在本大队找对象，就是在本公社找对象。她还补充说：“几乎没有单身汉”。

按照中国的标准，锦岗大队的生活是满不错的。有足够的口粮，人们显得很健壮。山边不断盖起一幢幢新的石头住房，人们的住房比起拥挤的北京或其它大城市来，要宽敞舒适得多。

象小儿麻痹和天花之类的死亡率很高的儿科病已被消灭了。人们能够有把握地抚育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同时，城里那种拥挤不堪的情景他们也是不了解的。收割季节忙过后，大部分人干的活就不那么辛苦了。

中国希望这足以将他们稳在农村，特别是当他们永远看不到上海的情况下，足以将他们稳住在那里。

简评：

《把他们稳在中国的农村》一稿中，提到锦岗大队的学校没有电力照明，但集体所有的电视机有十台，还有两家各自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穿插这些细节有助于说明以下思想：这个大队生产落后，设备也不好，但並不愚昧原始，目前，农民生活已有改善。这就是中国的农村——落后、不富裕，但农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政府希望这样能把农民稳定下来。这种善用细节的写法，值得我们借鉴。

私人裁缝生意兴隆

迈克尔·兰克

〔路透社上海1983年11月28日讯〕顾德华（音译）同他的父母亲住在一间小屋里，但是他成了他朋友羡慕的对象。

这是因为顾得华在上海当私人裁缝，每月挣150元，是一般青年工人平均工资的3倍，上海是中国最富最大的城市。

中国实行开明的经济改革，允许甚至鼓励那些希望赚钱的人开办国家监督下的私人商店。现在，中国有300多万人利用这次改革摆摊、开店。顾德华就是其中的一个。

顾德华坐在缝纫机旁说，“国营商店的裁缝做一套衣服要一个月，我只要一个星期；如果必要的话，当天就可以交货。”他家房间很小，在上海郊区。

他说他是在1980年开业的，他的手艺是他父亲教的。他父亲在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前也是私人裁缝。在“文化革命”中私营企业是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

像成千上万上海青年一样，顾德华在中学毕业后失业3年，后来他开业作裁缝。

“当我听说我可以当裁缝私人开业以后，我感到高兴。待业使人烦恼，我只好靠父母供养。”

他说，“现在我挣的钱是我父亲工资的两倍，他在一家集体企业里当裁缝。我们把挣的钱放在一起用。如果我有什么